

梁启超论趣味与趣味教育

魏义霞

内容提要 梁启超由推崇情感而推崇趣味,在从本体、人生和美学等不同角度诠释趣味的同时,大力提倡趣味教育。梁启超对趣味教育寄予厚望,与情感高于理性的哲学理念和心学主旨一脉相承,也使他的教育宗旨侧重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而独具特色。

关键词 梁启超 趣味 趣味教育

魏义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150086

梁启超由推崇心力而推崇情感,进而由推崇情感而推崇趣味。趣味又称情趣、兴味,是梁启超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是从作为宇宙本原的心入手讲情感进而讲趣味的,梁启超视界中的趣味具有多重意蕴,由本体哲学始,以人生哲学终。不仅如此,出于对趣味价值的凸显和对趣味地位的提升,他将趣味贯彻到人生、美学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中国近代别具一格的美学理念和教育理念。透过梁启超对趣味和趣味教育的论述,既可以直观地了解梁启超哲学的独特神韵和追求,又可以深刻把握其教育思想的宗旨和理念。

一、趣味的本体意蕴

梁启超宣称“境者心造也”,这一命题不仅具有本体论的意蕴,而且具有生存论的意蕴。“境者心造也”的思想主旨是,世界并非与人无涉,而是基于人的创造。在“境者心造也”的过程中,一方面,世界由于人之心力的创造而变得鲜活起来;另一方面,人凭借自由意志的创造而确证了自身,人的存在也拥有了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1]。因此,“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2]。由此可见,梁启超是沿着“境者心造也”的思路阐发趣味的价值和意义的,因此断言人以何种心、基于何种趣味进行创造,不仅决定了世界的模样,而且赋予自己不同的本质和存在。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重点课题“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GBB1213030)的中期成果。

[1][2]《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0页,第4070页。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由于人创造世界所凭借的心是情感而非理性,人对世界的自由创造实际上是凭借情感发出来的。情感的发动既保证了创造的过程由于远离理性的控制而不再呆板、机械,又由于除去了理性的算计,超越了功利之心而使人对世界的创造自由自在、兴趣盎然。人只要体悟到了这一点,从而不断地自由创造,便会与世界融为一体,同时也会拥有十分美满、生动精彩的人生;同样的道理,只有坚守这种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人生观,人生才会随之变得美渥、圆满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柏格森所见的,也很与儒家相近。他说宇宙一切现象,乃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方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识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他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或有人说,宇宙既是没有圆满的时期,我们何不静止不作,好吗?其实不然。人既为动物,便有动作的本能,穿衣吃饭,也是要动的。既是人生非动不可,我们就何妨就我们所喜欢做的,所认为当做的做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是远在几千万年几万万年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几的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进行中,长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不过跑了数寸,积累而成,才有今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为现在及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1]在这里,梁启超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意识流思想融入他所服膺的儒家哲学中,用以揭示宇宙真相和人生价值。循着这个思路,宇宙的一切现象作为人类意识流转的结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外化和呈现,归根结底是从人的内省直觉中发出来的。这就是说,创造作为人的本能,既是人的生存方式和自我确证,亦是个人对于人类不可逃遁的责任;正是通过人的自由创造,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同时也牢牢地操纵了世界的变化流转之权。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强调,趣味的作用——或者说,趣味对于人的不可或缺集中体现在人的自由创造之中。如果你问人为什么进行自由创造?人之自由创造是靠什么发动的?回答是:趣味。对此,他比喻说,如果将人看作是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创造是人之活动的本能,趣味则是发动人这架机器的燃料和动力。这就是说,趣味是人活动的不竭源泉,人类旺盛的创造力必须以浓厚而不竭的趣味作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趣味是人生的动力支持系统。循着这个思路不难想象,假如没有趣味,人的创造活动发动不起来,人生也会变得僵死而毫无生机;正如没有了燃料,即便是再精良的机器也无法发动,因而会陷入瘫痪。这用梁启超的话说便是:“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2]

在梁启超那里,世界的变化流转尤其是流转之权操诸我这个事实隐藏着深刻的道理,表明世界与人并非两个各不相干的孤立存在,而是休戚相关、同生共存的一体存在:一方面,世界对于人来说并非冷冰冰的存在,更非外在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人的存在亦非与世界无涉,而是通过对世界的创造,在世界的呈现中呈现自身,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正因为如此,世界如何以及将来会变成何状完全取决于人的创造——确切地说,取决于趣味发动的自由创造。这样一来,趣味便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人以情趣创造世界的话,那么,世界也会随之变得可亲可爱、充满情趣起来;如若不然,情形则恰好相反。至此,梁启超得出结论:情趣、趣味无论对于世界的存在还是对于人类的存在、个人的生存都意义重大——人是否具有情趣,是否凭借情趣不懈创造,不仅关涉宇宙的存在和流变,而且关涉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和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梁启超讲趣味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关注、膜拜趣味的动机和秘密所在。正是基于趣味对世界、对人生至关重要的认识,梁启超大张旗鼓且不遗余力地

[1]《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0页。

[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鼓吹、提倡趣味——不仅让趣味占领、统率人生、价值、美学和教育等诸多领域,致使趣味成为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理论旨归和逻辑主线,而且试图通过趣味教育培养趣味,将人引向趣味之途。

二、“趣味主义”的人生诉求

趣味的本体论、存在论意蕴表明了它对世界、对人生的至关重要,也预示了其对于人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将趣味贯彻到人生哲学之中,奉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以此鼓励人在趣味的驱动下自由创造。

综观梁启超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尽管以多变著称于世,甚至被诟病为流质易变,然而,追求趣味、享受乐趣、重视情趣是梁启超终其一生的不懈追求、情感寄托和行为鹄的。他甚至坦言,“梁启超”这三个字就是由趣味这种唯一的成分构成的,如果用化学的方法分析一下,分解到的唯一元素便是“趣味”。因此,除却趣味这种构成成分的话,“梁启超”这三个字将等于零:“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1]在梁启超看来,有趣味相伴的生活才有价值,趣味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人应该生活在趣味之中。因此,将人生建立在趣味之上,进而生活在趣味之中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和最佳状态。这是因为,既然趣味是人生的意义所在,那么,有趣味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既然趣味使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人也应该以趣味为行为目标和人生追求。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梁启超对趣味情有独钟,一贯主张“非唯”、反对任何主义的他不惜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宣布自己信仰的就是“趣味主义”,“趣味主义”是自己的唯一信仰: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2]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3]

梁启超宣布信仰“趣味主义”,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诉求,也将对趣味的提倡、崇尚推向了极致。梁启超对信仰和宗教具有自己的独特理解,给宗教下的定义是:“‘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对象有种种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义,或事情。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4]依据他的界定,信仰的对象就是宗教。梁启超的宗教定义表明,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对象是主义的话,那么,此一主义便成为这个人的宗教。依照这个标准,既然梁启超开诚布公地声明自己信仰“趣味主义”,那么,“趣味主义”便成为他的宗教。循着这个思路可以推定,既然“趣味主义”是梁启超的宗教,那么,他的行为便以趣味为目的,是在趣味的鼓动下进行的。事实正是如此。梁启超对于趣味的定义和诠释凝聚了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下面这段话不仅明确了趣味与道德的关系,而且将他的“趣味主义”诉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都(做——引者注)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象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

[1][2]《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第4013页。

[3]《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4]《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6页。

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1]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便是以趣味作为行为的准则和人生的目标,最终使“趣味主义”由他所追求的人生观进而成为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借用梁启超本人的表白便是,“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是近代“道德革命”的发起人,著名的《新民说》便是践行“道德革命”的结果。借助“道德革命”,梁启超并不是推崇“道德主义”,而是旨在提倡以民族主义、国家思想、公德观念、进取冒险精神和权利义务观念为核心的新道德。他眼中的道德有好亦有坏,以独善其身、束身寡过为核心的旧道德注重私德而漠视公德,导致中国人爱国心的缺失,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更显不合时宜,故而不能算做好的道德。与道德有别,趣味却无好坏之分;或者说,凡是趣味都是好的——“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有鉴于此,在梁启超那里,趣味比道德更重要——他不是用道德观念来判断、选择趣味,而是用趣味来选择人生。依据梁启超的分析,道德与趣味的区别在于:如果说道德侧重群体性、普适性的话,那么,趣味则是个性的、差异的。因此,“趣味主义”的价值观正如信仰一样,完全是个体化的,因为“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啜一口”^[2]。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趣味,梁启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兴趣的发动而忙碌,在忙碌中享受乐趣而快乐,人生充满情趣而自得其乐,是梁启超对自己生存状态和人生样式的最多描述。他不仅自己对这样的生活乐此不疲,津津有味而沾沾自喜;而且试图以这种方式感染、带动他人,一起加入到情趣盎然、趣味迸发而快乐的行列之中。于是,梁启超说道:“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3]

梁启超做事一贯以情趣为动机和动力,他的为学之道更是如此。梁启超评价自己爱根太重,对什么都爱上瘾,对学问亦不例外,故而“‘学问欲’极炽”。由于学术兴奋点时时转换,结果导致他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并且时常转移阵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著作有头无尾,不得而终。当然,梁启超的著作也有兴之所至,由于情不自禁而欲罢不能的情况,结果是为他人著作所作的序写得很长,以至于难免喧宾夺主之嫌,最终只能另行成书而独立出版,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便是如此。这些貌似矛盾的情形皆因情趣使然。其实,趣味使梁启超的著作有头无尾,也使他的学术研究——包括研究的结论在内由于兴趣点的转移难以持久、深入而有失系统,甚至前后相互矛盾。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本人有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4]

梁启超是“趣味主义”的提倡者,也是“趣味主义”的受益者。由于发自内心地信仰“趣味主义”,他对宇宙、对人生充满兴趣,由趣味而乐趣,由乐趣而乐观。梁启超由趣味而乐趣,由乐趣而乐观的人生态度、行为旨归通过其思想底色和基调充分表现出来。例如,同样推崇佛教,谭嗣同、章炳麟的佛教思想充满着浓郁的悲情、悲观乃至绝望基调,梁启超所讲的佛教却在承认万法皆空中走向精神自由和摆脱功利是非的豁达、快乐。因为内心是快乐的,梁启超总是能够随时随地地发现快乐。在这方面,他将功利主义翻译为乐利主义,侧重从“乐”的角度理解、宣传功利主义便是明证。众所周知,

[1][2][3]《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第4013页,第4013页。

[4]《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功利主义英文是 utilitarianism,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在西方文化语境中, 功利主义就是实用主义、功用主义, 表明此一学说具有追求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学术宗旨。梁启超将之称为乐利主义, 仅一个“乐”字便直观而生动地彰显了功利主义的趋乐宗旨和功用。围绕着从“乐”的角度解读功利主义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 他热衷于借助功利主义表达自己的快乐主义主张和诉求。例如, 梁启超对最先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的穆勒(今译为密尔)^[1]的观点是熟悉的, 却没有专门撰文介述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 而是专门撰文《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宣传边沁的观点。梁启超之所以选择边沁来介绍、宣传功利主义, 将边沁而非穆勒誉为功利主义的泰斗, 一个重要原因是: 边沁围绕苦乐情感对功利予以阐发, 这显然更贴近梁启超从“乐”的角度去界定、理解功利主义的立言宗旨和价值旨趣。与此相联系, 梁启超在文中着重介绍了边沁对苦乐种类的归纳和划分, 借此诠释自己对于群体与个人苦乐的看法, 进而呼吁个人为群体做出牺牲。进而言之, 梁启超的乐观主义精神固然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 同样与以“趣味主义”为出发点和归宿。

三、趣味的美学旨归

梁启超不仅将“趣味主义”贯彻到人生观、价值观之中, 而且贯彻到学术观、美学观之中, 致使趣味成为他最基本的美学旨归。不仅如此, 依照梁启超必须“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才是趣味的定义, 能称得上趣味的主要有劳作、游戏、艺术和学问四项主体。对于这四项趣味的主体, 他讲得最多——也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学问之趣味。

在梁启超那里, 趣味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 就初衷和动力来说, 只有为趣味而研究, 才能达到目的; 否则, 为功利所左右, 将学问当作手段, 则无法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 当然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学问。第二, 就过程和结果来说, 由于将趣味贯穿其中, 学术研究的过程不是恼人的负担, 而是趣味的享受和乐趣; 学术研究的结果不是枯燥的知识的堆积, 而是有机活泼的有趣之物。基于这种认识, 梁启超大声疾呼: “凡一学术之发达, 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2]这就是说, 趣味对于学术研究不可或缺, 是发动学术研究的动力源泉; 发动起来之后, 趣味的作用并没有完结, 而是继续决定着学术研究的过程或枯燥乏味、兴趣索然或兴趣盎然、津津有味, 直至最终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或成功或失败。

“趣味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美学旨归使梁启超眼中的学术研究成为趣事, 他的国学事业便是这一追求的最好注脚。梁启超提倡国学, 为国学的宣传和研究殚精竭虑, 同时也将国学当作一项有趣且快乐的事业。他呼吁治国学要走两条大路——一条是“德性学”(人生哲学)之路, 一条是“文献学”之路。其中, “德性学”旨在培养兴趣盎然的人生观, 将人生趣味化、艺术化, 贯穿其中的“趣味主义”追求不言而喻; 在“文献学”的四个组成部分中, 有三个部分直接与趣味直接相关。梁启超弘扬国学的初衷和将以历史学为重心的“文献学”作为治国学的大路之一, 目的是通过引导国民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 激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这种爱作为一种情感不是强制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 趣味是引向爱的通途。有鉴于此, 梁启超所讲的作为“文献学”的国学是可爱的, 各个部分内容殊绝, 却都极有趣味。正如认定历史是“文献的学问”中最有趣的部分一样, 梁启超形容社会状态学“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古典考释学“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均充满趣味。至于艺术鉴赏学, 面对的是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 这些作品令人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 趣味自不待言。对于他来说, 艺术鉴赏学不仅本身就是趣味之学, 而且是培养趣味之学。梁启超之所以将艺术鉴赏学纳入到“文献学”之中, 目的在于通过提升鉴赏水平, 培养国民对国学的趣味。总之, 无论对于国学的研究还是普及来说, 趣味都不是可有

[1]也有人认为是边沁最早使用功利主义一词, 见《外国哲学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第141页。

[2]《清代学术概论》,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第95页。

可无的而是举足轻重的。梁启超从来都不将国学以及国学研究作为呆板的、枯燥的、沉闷的谋生手段,更没有把古典文献视为索然无味、佶屈聱牙的古董,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对原本有趣的学问进行品味、欣赏。因此,梁启超眼中的“文献学”不惟不枯燥,反而极有趣味,美不胜收,接近它们令人兴趣盎然,乐在其中。正是这一点让梁启超相信,越发研究古代文献,越发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越发热爱我们的国学和民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由此喷薄而出,沛然莫之能御。

“趣味主义”是梁启超的价值主旨和美学理念,被梁启超贯彻到一切言行之中。他提倡的思想以趣味为旨归,他宣传、写作的方式充满情趣,令人趣味盎然。由于将“趣味主义”贯彻到底,梁启超的思想和写作从选题到表达都极尽趣味之能事。例如,梁启超和严复都热衷于介绍西方学说,所采取的方式却迥然相异:严复以学术著作为主线,介绍的方式是系统翻译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等人的大部头著作,注重思想的专业性、系统性;梁启超则以人物为主线,选择学案的形式进行介绍,侧重思想的趣味性、普及性。学案是中国特产,这一体裁有些类似于西方的人物传记。由于篇幅短小精悍,学案利于报纸、杂志刊载。同时,由于内容深入浅出,学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有助于吸引众多读者。学案以思想介绍为主,为了吸引人,梁启超在介绍传主的思想之前,先介绍他们的生平趣事。这样做既照顾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又达到了介绍、传播思想的目的。进而言之,趣味与清新明快、活泼生动为伍,晦涩沉闷则是败坏趣味的元凶。与秉持“趣味主义”相一致,梁启超在选题上下足了功夫,甚至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搜罗一些奇闻轶事。《不婚之伟人》、《张勤果公佚事》等便是这一追求的典型例子。

作为梁启超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念,趣味不仅决定了他的选题和文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各种文学样式的选择和思想启蒙的方式。还是以梁启超与严复相比较,在输入西学方面,如果说严复是学问家,走的是专家路线,致使他的学说与普通民众格格不入的话,那么,梁启超则不啻为一位普及家,作为一位宣传员时时刻刻想着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于是,梁启超由“趣味主义”而走向通俗路线,这既是“新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也是“趣味主义”使然。

四、趣味的教育宗旨

出于对兴趣和趣味的极度热情,梁启超大声疾呼趣味教育。他强调指出:“‘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1]尽管如此,自己对趣味教育的标举和青睐却与西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自己所提倡的是最坚决、最彻底的趣味教育。这是因为,自己不仅像西方那样以趣味为手段,而且更进一步以趣味为目的本身。很显然,将趣味当作目的与梁启超公开声称自己信仰“趣味主义”息息相通。

梁启超提倡的趣味教育以培养仁者人格、使人远离忧愁为鹄的。在这方面,梁启超十分赞同孔子关于“仁者不忧”的说法,强调不忧与仁者相关,是就“普遍人格”而言的;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各人有各人的快乐和趣味。正因为如此,趣味教育从大的方面说,旨在培养仁者人格;从小的方面说,旨在陶冶性情,培养兴趣。在梁启超所讲的趣味的四项主体中,无论是劳作、游戏、学问还是艺术都包括个体方面的内容。有鉴于此,在培养仁者人格的同时,梁启超从个人的兴趣入手,为人培养乐趣、远离烦恼指点迷津。为此,梁启超肯定趣味、兴趣在于培养,并且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培养学术兴趣为例,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培养趣味的办法和途径。

其一,无所为。梁启超之所以如痴如醉地推崇情感,并且具有排斥理性或哲学的思想倾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认定理性计较后果,哲学攻于算计,而这些都与超越功利的情感相悖,最终将会导致趣味的丧失。沿着这个逻辑,为了品尝趣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摆脱功利之心,全凭兴趣使然。梁启超

[1]《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将之称为“无所为”。

对于如何“无所为”，梁启超解释说：“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之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便，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1]这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只要先悬一个目的，便会被目的所左右而不能尽情挥洒；只有不计目的，才能不被利益所牵制，最终发现做事本身的乐趣。换言之，凡是做事，只有摆脱功利目的，才能够真正地乐在其中。这种摆脱了功利目的而做事的心态便是“无所为”。“无所为”意为什么都不为，只为事情本身——如为学问而学问，为写作而写作，为游戏而游戏，为生活而生活等等。质言之，“无所为”就是不以所做的事情为手段，而是以之作为目的本身。梁启超相信，如果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彻底摆脱“所为者”，一切皆出于“无所为”，便可以尽情地投入到所做的事情之中，自然会酣畅淋漓，兴趣大发。

其二，不息。梁启超认为，趣味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而成的；趣味既然是养成的，也就意味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一个培养、“上瘾”的过程。拿以吸鸦片为乐趣的人为例，这些人为什么会为对鸦片“上瘾”？因为“天天吃”！为什么要“天天吃”？因为成瘾了！可见，“天天吃”与“上瘾”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二者相互作用——“天天吃”不仅使人“上瘾”，而且使“上瘾”的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天天吃”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实，不惟吸鸦片这样，万事无不如此。因为人的本能就是习惯成自然，无论对于何事，只要不间断地天天去做，迟早都会“上瘾”，趣味当然概莫能外。由此，梁启超认定，趣味的养成就是一个坚持不懈、慢慢成瘾的过程：“‘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搁（搁——引者注）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那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2]

在呼吁慢慢培养、通过日积月累的“天天”坚持使人“上瘾”，从正面培养趣味的同时，梁启超揭示了人们对学问打不起兴趣的原因：正如人身体的各个零件长时间搁置不用便会麻木生锈一样，经常刺激人的欲望，便会生发出趣味。其实，“学问欲”是人之本能，所以出现对学问不感兴趣的现象，是因为人一出学校大门便将学问搁置一旁，由于将经营学问的器官一同打入冷宫，久而久之，人这部分的器官便生锈了，退化了。对学问打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便是“学问胃弱”。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提出了如下的应对措施：找准自己嗜好的学问，每天无论多忙、多累，都要挤出一定的时间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天天如此，绝不中断；如此坚持下去，直到发现兴趣的乐趣而对学问欲罢不能。他坚信，这样做既可以使人对学问葆有永不衰竭的兴趣，又可以让人受益终身。

其三，深入研究。梁启超之所以将深入研究视为培养兴趣的重要途径，旨在强调，对一种学问浅

[1][2]《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第4013-4014页。

尝则止便不会发生趣味,只有像吃甘蔗那样由外至内,由表及里,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研究,才能发现学问的魅力和精髓所在,从而兴趣大发,趣味大增。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终身选择一、二项自己的嗜好坚持不懈,进行深入研究才是培养、激发趣味的有效途径。对此,梁启超写道:“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象到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入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1]在他看来,趣味的培养需要时间,也需要精神专注,专心致志。只有长时间对某事的专注和执著,趣味才可能自然来袭。当人在趣味的驱使下对某事“欲罢不能”时,人便真正领悟了趣味的乐趣,由此踏上了快乐之旅,人生也随之变得大不相同。

其四,找朋友。对于趣味,梁启超曾经做过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比喻:趣味比方电。趣味靠朋友之间的相互切磋产生,正如摩擦生电一样。如果说不息和深入研究是内力,都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的话,那么,找朋友则是靠外力,通过朋友间的切磋、帮助和扶持,借助外力增加趣味。对于趣味的培养来说,内力固然必不可少,外力同样不容忽视——人总有堕怠偷懒的时候,这时候就急需外力来推动、鼓励一下;如果能够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助,那将十分给力,也十分惬意。总之,内力与外力相互作用是培养趣味的最佳途径,在与朋友的切磋中寻找、培养、激发和保持兴趣,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2]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对趣味的津津乐道引人瞩目,对趣味的阐发和推崇既是其情感说的一部分,也是其心学的重要特色和内容。这就是说,他的趣味说与情感说一脉相承,秉持心学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正由于对趣味的关注和推崇,梁启超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家中难得的乐观主义者和快乐主义者,这一点在谭嗣同、王国维和章炳麟等人的悲观主义的映衬下更显卓尔不群。当然,梁启超能够由情感始以快乐终,得益于他的趣味教育。就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而言,由于他是从本体论、生存论开始讲趣味的,在使趣味拥有多重意蕴的同时,也使趣味教育以哲学为根基,侧重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故而不是侧重生存技能的训练,而是注重人格的培养。事实证明,这种教育理念是全面的,也是更有成效的。

[责任编辑:肖波]

[1][2]《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页,第4014页。